



陕甘宁边区农林政策的历史价值

□ 白均堂 薛婧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边区政府发展农业科技是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环节,从而边区政府实施各种农业科技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使边区的农业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间接支援了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意识到农林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早在 1938 年 1 月 15 日《经济问题决议案》中就已提出我们需要设立农业技术改良机关,组织群众制造大量农具,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比如指导农民进行育种插秧施肥等各种农业技术的改良。1940 年 8 月 13 日公布的《中共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规定“发展农业……改良种子、肥料、农具等农业生产技术”,“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1]。在 1941 年 6 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论经济与技术工作》、《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等重要社论,这些社论的发表只有一个宗旨:中共中央在面临日军的侵略、国军的封锁这两大严峻考验的危急时刻,要求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要有大批的从事各种科学技术工作的科技人才,尤其是关系民生的农业科技人才。毛泽东在 1942 年《关于发展农业》中明确指出: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已被列入国家政策范畴,我们要以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知识为基础,以先进的农业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农业产量为目的,坚持农业科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争取在缓解民生问题的同时支援前线抗战。这一系列的政策与指示不仅仅强调了农业生产技术对发展边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而且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2. 设立专门机构,吸纳农业人才。为了吸纳农业科技人才,边区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农

业科研机关,集合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主要有畜牧专家陈凌风、张克威,农学家陈凤桐、李世俊,农林生物学家乐天宇,植物病理学家康迪等,以及林山、唐川等杰出的农业技师。在这些农业专家和农业技师的带领下,科研机关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根据地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边区政府于 1940 年 2 月在延安创立延安光华农场,主要工作方向就是研究农作物栽培技术、培育优良品种、改良农业生产工具、防治病虫害等。在 1939 年边区政府在延安还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和农业学校。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设立了生物系,在大学部和中学部都分别设有与农林科学相关的科目,如农业园艺、森林畜牧、农林畜牧等。延安农业学校分设农艺、园艺、畜牧三个部,在学校附近都设有专供师生进行研究的实验农场。这些科研机关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为促进边区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农业生产发展,乃至建国初期农业发展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 组织科学考察,提出改良措施。边区政府先后组织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进行科学考察,考察范围遍及边区各县及许多乡村,考察内容涉及土壤性质、农林作物、矿产资源、水利建设等。这次考察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为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为边区政府进行生态保护工作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在 1940 年 5 月,森林考察团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宇的带领下历经 40 余天,对边区 10 数县区的森林资源进行了科学考察,并写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考察团运用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的农林考察技术,首次对边区的森林面积、树种分布、保护森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护森林与边区农业生产、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保护森林的具体措施,比如山坡坡度在 80% 以上者为林带,27%—80% 者为牧带,27% 以下者为农垦带,国营农场垦荒坡度不得超过 36% 等。此次森林考察所提出的农林现状、农林发展方向与农林保护措施,在众多科学数据的支撑下凸显了农林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并引起了边区政府对农林业的进一步重视和关注,从而为边区制订农林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环境。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人民兴起了修水利保农田运动,如杨桥畔水渠、裴庄水渠等引河水灌溉的水利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修筑的。同时各地还普遍推广修水壕、打坝堰、拍畔等方

法,以防止水土流失,增加地力。1939 年靖边县政府成立水利建设局,同时动员人民群众组成水利委员会,对杨桥畔水渠进行了检修,对破损地方进行补修,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修,使其水流量达到每秒 1 立方米,灌溉范围扩展到一昼夜 1440 亩,并使水田里农作物的产量都有所提高,如种麦子每亩可收 1 石,秋底还可收黑豆三四斗和萝卜 10 多袋(约八九百斤)。延安的裴庄水渠也经过多次检修,经它灌溉的种植细粮的农田,每亩增收 3 斗,一年可增收细粮 32175 石。据现有的边区农林资料统计,总计全边区 1943 年共有水地 136476 亩。在流水无法到达的地方边区经常通过打井水灌溉,达到增产目的,井水灌溉的水田比旱地的收获量多约 1 倍以上,这种灌溉方式在边区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仅在绥德分区沿黄河一带、延安各机关附近利用井水灌溉,多用于种菜和小面积农作物。边区政府倡导人民兴修水利不仅改善了农业环境,而且缓解了民生问题,间接支援了前线抗战。

5. 引优品,改耕作,革农具。边区农作物主要包括两大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在推广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如狼尾谷经过两年的推广,播种范围覆盖到 17 个县,共计有 10180 亩。边区政府还引进和培育蔬菜、瓜果等优良品种,以各县及各机关生产农场为据点,共计推广 41 种,1435 亩^[2]。经济作物方面主要是养蚕业,如蚕种改良、养蚕法的改进等。养蚕业自从 1943 年以来发展比较迅速,从养蚕户来看,1943 年为 11796 户,较 1942 年增加 29.37%;从养蚕量来看,1943 年为 75284.2 升,较 1942 年增加 52%;从出蚕量来看,1943 年为 54741 升,增加 46.87%^[3]。另外,从养蚕业的分布来看,分布范围明显较抗战前扩大了,由清涧、绥德、吴堡、安定 4 县扩展到包括米脂、绥西、佳县在内的 7 县。

农业耕作有深耕、施肥、除草三方面。深耕有指犁耕、多耕、细耕等。如关中平原的新正县于 1943 年对有些农作物的耕作注意细耕后,这些农作物的产量比不注意细耕的每亩地多收一斗。边区农村也开始尝试用施肥来恢复地力。农民对农作物施肥日益普遍,并深入各户,在现有的肥料供不应求时,边区政府积极倡导制肥,主要有积肥和造肥两种方法。这些办法为农业生产提供广泛的肥料来源,使农业生产均达到有肥可上。“锄沟有水”这是农民对于除草功效的评语。抗战以来,边区政府号召人民要及时除草,各地农民积极响应,如绥德张家圪崂村的所有秋

华俄道胜银行是近代外国金融势力进入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国政府正式用合同方式承诺的中外合办银行。甲午中日战争后,俄国为了加强对华经济渗透和资本扩张,1895年12月俄法合资在圣彼得堡成立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2月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1896年9月,清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中俄银行合同》,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华俄道胜银行,股金由该行在俄法“四厘借款”内扣拨支付。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铁岭、旅顺、大连、宽城子、长辛店、海拉尔、北京、天津、汉口、伊犁、喀什、宁古塔等地广设分支机构,以东北、新疆和内地为主要活动场所,进行掠夺式经营长达30年之久。华俄道胜银行名义上为中俄“合办”,实际上被沙俄独占,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完全掌握在俄方手中,中国无权过问银行的一切事务。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有力工具,除投资修筑中东铁路外,还大量投资于东北的金、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开发。



一、华俄道胜银行对东北金矿的投资

1897年6月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公司组成中国矿藏勘查公司,资本为50万卢布,分为100股。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罗特什捷英、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公司各按22.5%分发红利,董事5%,其余50%分给股东。1900年1月中国矿藏勘查公司改组为蒙古土谢图汗盟和车臣汗盟矿业股份公司(蒙古矿业公司),开采蒙古金矿。蒙古矿业公司额定资本为300万卢布,分作1.2万股,实收180万卢布。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

斯基、总经理罗特什捷英为该公司董事。该公司从1901年到1903年共产金9367盎司,价值37.7万卢布。1904年至1913年,该公司产金266575盎司,价值960万卢布。1912年,公司资本由180万卢布增至300万卢布^{[1][2]}。

1899年华俄道胜银行与英国人罗斯及吉尔伯特公司成立英俄开拓公司,开采营口到山海关一带的金矿。其中华俄道胜银行100股,英国人罗斯800股,吉尔伯特公司200股。1902年华俄道胜银行收买了罗斯的800股,从而拥有该公司总资本的90%^{[3][2]}。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出兵中国东北,强占了漠河和观音山金矿。为了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副代办宝至德以向清政府缴纳“报效银”为手段,企图使开采合法化,但终未得逞。从1903年起,中国为了收回漠河、观音山金矿多次与俄方交涉。直到1906年10月和1907年2月,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与哈尔滨分行经理高培里向中国勒索了1.2万卢布后,才向中国政府交还了观音山和漠河金矿^{[4][5]}。

华俄道胜银行 对近代东北的矿业投资

□ 郭立彬

在清政府与俄军进行撤兵谈判时,华俄道胜银行代表乌赫托姆斯基、璞科第在北京先后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要求在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前,须先达成华俄道胜银行与中国政府间的“私方”协定,把东北全境的工矿业与铁路的租让权,提供给“中俄合办”的华俄道胜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与清政府间的谈判虽未获得结果,但沙俄与东北三省地方当局的谈判却打开了缺口。1901年沙俄驻江两省办理交涉事务大臣臣巴,与吉林将军长顺订立《开办吉林矿山草约》,允许俄商在吉林各处开采金矿。随后,沙俄与吉、黑两省又订立一系列采矿合同,获得在中国东北广大区域

内勘探和开采金、煤、铁等矿产资源的权力。

1902年11月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致函外务部,申请开采热河的热水文金矿,但未获批准。1903年6月,又由华商李万芳、于致祺出面设立益华丰公司,招收华股1.5万两,华俄道胜银行附股1.5万两,再次呈报外务部要求开采热水文金矿,也未获批准。

1902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华商梁益诚等人集资40万两,设立义胜鑫矿务总公司,又称奉天矿业公司。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出资15万两,中国股东15万两,奉天银库5万两。义胜鑫公司申请开采鸡爪山等地的银、铁、煤、铜等矿45处,后清政府同意先行试办鸡爪山等地12处^{[3][9]}。

二、华俄道胜银行对东北煤炭业的投资

在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的谈判中,俄国要求在满洲获得煤矿开采权,清政府同意为中东铁路公司提供在满洲免税开采煤矿的权力。在俄方制订的中东铁路章程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许该公司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4][10]}1898年,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

理璞科第与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取得了从中东铁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到旅顺、大连的权力,同时,中东铁路

公司正式获准了在满洲开采煤矿的权力。在铁路正式运营后,中东铁路公司又以铁路需用煤炭为名,于1907年8月与吉林、黑龙江两省签订了《吉林铁路煤矿章程》和《黑龙江铁路煤矿合同》,规定中东铁路公司可以开采铁路沿线两旁30里内的煤矿。

抚顺煤炭资源丰富,质地优良,宜于开采。1902年经奉天将军增祺批准,华商王承尧集股银10万两,组织华兴利公司,开采河西千金寨的煤田。同年,翁寿筹资7万多两,设立抚顺煤矿公司,开采河东老虎台一带的煤矿。随后,与华俄道胜银行往来密切的俄籍华人纪凤台以1.3万两股金入股抚顺煤矿公

田最少都锄过四次,有的甚至达到了六次,在政府的引导下,多锄地的耕作方法逐渐被农民接受并推广。

同时边区政府也很重视革新农具,因为这对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来说举足轻重。据统计,1943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工具修理厂和农具制造厂八个,以后亦有所增加。这些工厂为农具的革新打下坚实的基

础,为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政府认识到农业科技政策的重要性,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设立专门机构广纳农林人才为农林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组织考察团进行科学调查为农林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兴水利、引优品、改耕作、革新农具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具体途径。这一系列政策不仅巩固、发展了边区革命根据地,为赢得抗日战争

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 [1]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2]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Z].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3]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作者简介:白均堂,陕西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薛婧,陕西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